

育危机。教师后继无人只是问题的一方面，当务之急是现岗位上的教师不合格所在多有，德才学识体全面素质亟待提高，否则将误人子弟，贻害民族。

因为立足于传统文化积淀过厚的古老土地，崇尚“师承”，依附中庸，文人相轻，嫉贤妒能等等扭曲的心态也不同程度的影响着教师队伍。这类教育思想往往无视当代青少年的心理特征，伤害他们的自尊心，抹煞他们的特长，摧残他们的个性，造成僵化局面。如此下去，教育内部的生命力也就停止了。

1985年9月22日《光明日报》“每周评论”专栏中一篇署名文章，题为“苏步青效应”。苏先生认为，不是“名师出高徒”，而是“高徒捧名师”。培养超过自己的学生是教师的天职，是现代教育规律乃至现代科学发展的集中体现和基本保证。“学生超过老师”是世界科学史所证明了的一条真理。这并不是什么新论题。他从教32年就是以“教师的成功在于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”（陶行知：《创造宣言》）为座右铭的。但在当前，提倡苏步青效应有突出的现实意义，它是启动教育内部活力的一剂良药。

试想，我们现在教出的学生不如我们，我们的学生将来教出的学生不如他们，那还不是九斤老太吃蚕豆——一代不如一代吗？要想我们的民族兴旺发达，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，就成为梦呓。我们要做合格的教师，首先要端正教育思想，以博大的胸怀鼓励学生脱颖而出，出类拔萃。如果说“不想当冠军的，不是好运动员”，我们完全有理由说：“不想让学生超过自己的，就不是好教师。”

实施苏步青效应，不仅是教师的义务，而且是整个社会的责任；不仅是现实的需要，而且具有长远的意义。早在五四运动时期，鲁迅先生就指出：“只要思想未遭禁锢的人，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、更健康、更聪明高尚——更幸福；就是超越了自己，超越了过去。”早在30年代，陶行知先生就呼吁：“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，才能继续不断地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，保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。”作为站在人类未来的摇篮边的教师对此难道不应深思么！苏步青效应就是“现代文明的钥匙”，实施苏步青效应，是遏止产生马太效应的一个政策，也是提高我们全民族素质、推动我们国家现代化事业的一剂良药。

解脱教育危机的关键在哪里？

WHAT IS THE KEY TO RIDDANCE FROM EDUCATIONAL CRISIS?

原北京顺义扬镇中学校长 纪秩尚

(一)

有人说：十年来我们教育事业的成绩是主要的，因而不存在教育危机。这种说法把二者对立起来了，好象一谈危机就否定了成绩。有远见、有抱负的民族都提倡“居安思危”，何况我国的教育远没有达到“居安”的水平。

我国教育从纵向比较，建国以来，特别是近十年来有很大发展，成绩显著。但从横向比较，却是大大地落后了。我们且不去和发达国家比，只和南朝鲜、泰国、台湾省比，甚至和印度比，都远远落后了（这些地区在50年代初和我国沿海各省的水平相近）。这个严峻的事实，提醒我们必须正视：我们还没有摆脱教育危机。

众所周知，“文革”十年造成了一次教育大危机。那是偶然发生的吗？如果认真反思，就会发现：它萌芽于50年代，发展于60年代，70年代陷于危机的深渊，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思想根源。

50年代初，由批判“武训传”发展到否定许多爱国志士的私人办学，进而把所有私立学校收归公办，最终形成了教育的“统包制”，堵塞了多种形式办学的渠道；从批判“教育救国论”，到否定教育的继承性、多样性和相对独立性，形成了狭隘的、封闭的、单一化思想模式。1957年的“反右”和“外行领导内行论”，种下了歧视教师，轻视知识的恶果。1958年的“盲目跃进”和随后的“瓜菜代”低标准，在混乱中教育的随意性思潮泛滥，种下了忽视教育规律，轻视教育质量的种子。50年代正是许多国家把教育作为发展经济和科技的基础，“教育立国”，互相借鉴，智力竞争，加倍投资，进行教育全面革新的重要时期。对比之下，我国在教育上的失误的严重后果就十分清楚了。

60年代初，在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方针指引下，我国教育刚走上较为正常的发展道路，又响起了“反修防修”的号角，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否定了一切过去的和外域的教育科学，“四清”运动在学校重新组织阶级队伍。发展到“文革”，对教育全面开刀，优秀教师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倒了。

到了70年代，林彪自我爆炸以后，如果能坚决

纠正“左”的严重错误，教育的损失可能会小些。事实却完全相反，从强化贫下中农管学，到工农兵进校掺沙子，发展到批判“师道尊严”，宣扬“白卷英雄”等，这一切从精神元气上彻底把教育搞垮了。

这次教育危机发生过程的直接后果是摧残了教育，摧残了教师，贻误了后代。其恶劣影响则是造成了一种“轻教贱师”的愚昧社会病。特别在党内，在领导层里长期形成的对教育的错误观念和狭隘思想，危害是深远的。80年代初，经过教育结构改革和体制改革，出现了新的转机。但这仅仅是开始，而且只是局部性的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转机中仍蕴藏着危机。第一，当前教育上的问题成堆，困难如山，缺师资，少经费，设备简陋，质量下降，还没有从根本上找到解决的出路。第二，许多干部，特别是各级主要领导，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没有把教育兴衰看成自己的责任，没有把教育真正摆到战略地位上。第三，造成萌芽时期教育危机的主客观原因还残存着，旧的体制、制度和僵化思想处处阻碍着乃至扼制着教育发展的活力。因此，面对转机有两种前途：一是把握转机，扩大成果，使全国教育和经济同步发展，由“温饱”进入“小康”，达到现代化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；另一前途是坐失转机，冷落教育，则必将陷入新的危机。

(二)

防止新的教育危机出现，是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，要综合治理。但关键在领导，特别是各级主要领导。从我几年来接触、了解的情况看，在广大农村地区，当前各级领导对教育的态度大致可分成三种情况。

一种是既重视教育，又善于领导。他们决策正确，在师资、经费和改善办学条件诸方面均有突破。如山东和辽宁省，河北的平度、海城和昌平等县，还有一些乡村如上苑乡、东房身村等。这类地区的领导虽属少数（在全国30个省市，2300多个县和460多万个乡镇中约占10%），却起了示范、带头和鼓舞人心的作用。

第二种情况是，比过去重视了，但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。增加了一点教育经费，但效益不高；教育之重要性未深入人心；教育的被动、落后局面还没有明显改变。这类领导是多数，约占60%。他们对教育的认识和领导水平亟待提高。

第三种情况是，对教育还很不重视，没有真正承担起搞好教育的职责。各种问题不断出现：挪用教育经费；危房倒塌，师生伤亡；流氓闹学，殴打教师；乱校乱班，弃教逃学，如最近闽东有800名教师从商，百余所学校关门；忽视义务教育

法，招收童工，学生大量辍学，如湖北省竟有150万适龄儿童失学；教师队伍流失严重，等等。这些地区的群众纷纷发出“教育处于危急之中！”“救救孩子！”的呼声。这类领导约占30%，影响极坏，应限期令其改正，对长期失职者，应坚决撤职查处。

对教育的态度问题，在中央同样存在。有的领导，有的部门，对党代会和全国人大的决议，执行不得力，不认真，言行脱节。如教育经费的两个增长没有切实保证；亟待解决的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的地位待遇问题，长期议而不决；教育发展与经济规划的全国性决策迟迟定不下来；一些重大的属于中央职权范围内的教育政策还不明确，等等。实际上在中央领导层中提高对教育的认识，统一思想，是问题的关键。

不重视教育的领导，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：（1）认识低，缺乏现代教育观念和高瞻远瞩的胸怀；重钱轻智，见物不见人。（2）职责不明，没有建立教育的宏观管理责任制，上下推诿，左右扯皮。（3）作风不正。据审计部门查出，全国有2000个县（占80%）共挪用教育经费4.2亿元（其中不乏用挪用款项购买高级轿车的）。这是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，却不见严肃处理。

(三)

三点建议：

第一，认真反思，重新认识。

各级领导都学学教育经济学，树立现代大教育观念，弄清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及其良性循环的规律，提高对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和自觉性。各级党校（全国有几千所）应普遍增加这方面的教学内容，以促进各部门党的干部和全党更新教育观念。并通过多种形式，将这种学习扩展到全社会。山东在这方面的经验较好，几年来筹集教育经费25亿元，使校舍和教学设备的改善达到了“六配套”。平度县每年增加教育投资1000多万元，形成了持久的“办学热”。

第二，把教育立法和建立教育宏观管理责任制结合起来。

一切教育发达的国家都有一套完备的教育法规。我国的义务教育法公布后，凡认真实施的地区，都已初见成效。现在急待进一步制定综合性的教育法。任何重大的教育问题，都应有专人和机构负责。教育上出现失误，有关领导干部要作为法人承担责任。

第三，加速师资队伍的建设。

教师是教育事业的支柱，是教育质量的决定因素。我们现在的师资队伍可以说是：先天不足，

后天失调。从50年代初的社会招聘,1958年的动员中学生留校当教师,“文革”中的“掺沙子”,80年代初的“顶替接班”和长期请代课教师,直到现在派讲师团,反映了教师培训无计划、无安排,与教育发展严重脱节的情况。多数地区因教师不配套(普遍缺体、音、美、外语、史地等科教师)而不能开全课程。劳动技术课一直没有教师编制和来源。这种残缺不全的教师队伍,怎能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全面发展和一技之长相结合的人才呢?

解决的办法是首先加强和改进师范教育,保证稳定的师资来源。县办师范负责小学和幼儿园师资;地(市)办师专负责初中师资;省(市)办师院和大学附设师资班负责高中和职业学校师资。中央放宽人事劳资政策,鼓励因地制宜。限期十年左右基本解决师资缺额、缺科问题。其次,采取应急措施以补救当前师资短缺和不久将面临的教师“断层”现象。下大决心动员各级党政机关和其他事业单位的干部(除去老弱病残者),分期分批到教育第一线从教一二年。每批抽调1/10,十年轮流一次,渡过教育的困难期。第三,加强在职教师培训,改善教师待遇。教师长期肩负着培养后一代的光荣任务,兢兢业业,任劳任怨。要下大决心改善他们的生活,全面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。

相信这样坚持奋斗十几年,定会摆脱教育危机,出现教育全面振兴的新局面。

对当前我国普教现状的 一点看法和回顾

AN OPINION ON THE CURRENT STATE IN GENERAL EDUCATION

北大附中校长 夏学之

一、对我国普教现状的看法

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。

多年来国家领导人和各级领导,说了不少要重视教育,尤其要重视普及教育的话,也作出了许多决议,强调要把教育放在战略地位上来抓,也做了一些实事。但是总体效应如何呢?我们知道,办教育需要许多方面的条件,但是最根本的条件还是师资,也就是得有老师,特别是要有好老师。可是至今一流人才,二流人才,甚至三流人才都不肯从教。目前教师的数量、质量严重不适应需要,

而且无论数和质都在急速下降。这就是当前教育的现状,是已经明显显示出来的危机,而且是越来越严重的危机,即使现在立即采取战略措施,已为时不早了。何况从现在种种迹象来看,尚无“亡羊补牢”之举。谁都明白,教育危机就是人才危机,就是国家、民族的危机,这是无需再争论的了。南朝鲜不足2 000万人口的小国,竟成为四小龙之一,成为体育强国,奥妙就在于狠抓教育的结果。教育投资超过其国民收入的20%。

有识之士不从教,不能怪有识之士,因为有识之士是人,是实实在在生活于现实的人,他们不能不在现实社会中采取现实的态度,权衡现实的实实在在的利害关系。因此有识之士不从教是多年来国家一系列教育政策导致的恶果,要从国策上找原因。与其回顾历史,不如看看现实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划时代的会议,是提出、制定出新的国策的会议。党的十三大总结、深化、发展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国策,归结一点,新的国策就是对外开放,搞活经济。十个年头了、开放了、搞活了,政绩卓著,可谓英明、伟大,我也十分拥护。但是在普教战线上的同志,越来越感到迷惑、费解、忧虑。

今年在七届人大、政协两个会上,教育问题成了热门话题,但是这两个会议对教育,特别是对普教,都未采取任何战略措施,令人失望。尽管教委负责人为解决教育经费问题开了两副药方:一曰,大学教师搞有偿服务,二曰中小学勤工俭学。但这充其量只不过是两剂APC!身为教委负责人难道不知道对教育采取战略措施的紧迫性吗?中小学都靠自己勤工俭学从宏观上能自救得了吗?无怪乎,近日在报刊上看到某地区某学校全体师生停课到街上去卖烂苹果了。悲乎!

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先生在人代会上大声疾呼“重视教育,否则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”,这话说中了要害。

我们的国策是对外开放,搞活经济,这非常必要,但冷静地思考一番,似乎缺点什么,似乎有“见钱不见人”的味道。宏观管理学、战略管理学、微观管理学、教育管理学、工企业管理学,诸多管理学有一共同之大忌,即不能见物不见人(或见钱不见人)。日本丰田经验就是重视人才的发掘,培养人才,调动人的积极性,而我们的国策实际上却是见钱不见人。我建议决策者,在“对外开放、搞活经济”后面加一句“把教育搞上去。”

二、对教育的回顾

建国以来,中国教育大体上是凯洛夫教育学